

中国无神论论

文集



中国无神论学会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中 国 无 神 论

文 集

中 国 无 神 论 学 会 编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中国无神论

文 集

中国无神论学会编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625印张 1插页 262,000字

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100

统一书号：2106·67 定价：1.23元

DF86/05

出版说明

宣传唯物主义无神论，破除宗教和封建迷信等精神枷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战线上的一项重要任务。列宁曾经指出，要用我们的书刊、我们的言论来跟宗教进行斗争。还说，在这个斗争中，马克思主义者要善于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说明群众信仰宗教的根源。

一九八〇年十月，在武汉举行的中国无神论学术会议上，对当前无神论的宣传和科学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对宗教和封建迷信发生发展的历史，以及无神论同有神论的斗争规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会议收到学术论文五十多篇，这个文集就是这些论文的选编。论文大体属于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无神论的基本原理，分析宗教和封建迷信思想发生、发展及其消亡的社会历史条件；二、评述明清之际著名无神论者熊伯龙及其《无何集》在无神论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三、评价我国历史上一些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无神论者孔丘、晏婴、庄周、王充、陶渊明、柳宗元、谢应芳、洪亮吉、章太炎和易白沙的无神论思想及其历史作用，并对佛教、道教和谶纬神学进行了批判。

目 录

正确认识宗教问题的科学指南

- 重读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吕大吉 (1)
学习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有关宗教论述的几点体会曹 琦 李文厚 韩秉芳 (22)
关于正确处理宗教的问题
——读列宁《社会主义和宗教》、《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两文札记唐 尧 (38)
- 从王充到熊伯龙任继愈 (52)
论《无何集》的思想特征和历史地位唐明邦 (62)
清初杰出的无神论者熊伯龙高士介 郑桓武 (80)
剖析《无何集》 探索“无何学派”谢雨春 (90)
评价熊伯龙思想方法论的几个问题张 瑰 黎德扬 黄劭邦 (106)

孔子学说与中国无神论思想的关系

- 《中国无神论史初探》续篇牙含章 (123)
晏婴的无神论思想艾力农 (142)

- 庄子的反传统宗教思想 张季平 (156)
- 陶渊明无神论思想试探
——兼论中国古代无神论与有神论的思想界线及其通向 李锦全 (166)
- 魏晋早期的般若学与慧远的宗教神学理论述评 王友三 (175)
- 南北朝时期的道教思想 杨宪邦 (187)
- 略论早期道教关于生死、神形问题的理论 汤一介 (206)
- 试论葛洪的神仙不死思想 卿希泰 (227)
- 柳宗元的无神论思想 钟兴锦 (243)
- 试论元明之际的重要无神论者谢应芳 马俊南 (254)
- 清代杰出的无神论思想家洪亮吉 金春峰 (272)
- 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无神论思想的新特点 吴熙钊 (288)
- 试论章太炎反对有神论及推进革命的思想武器——佛学思想 高振农 (300)
- 易白沙和他的《诸子无鬼论》 王兴国 (315)
- 附录：中国无神论学术会议讨论综述 (329)**

正确认识宗教问题的科学指南

——重读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吕 大 吉

—

宗教信仰，涉及广大人口，紧张牵动着善男信女的心弦，一有触动，常常发出激越的回响。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宗教问题都很重要。这些年来，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宗教领域推行极左路线，使宗教问题更加复杂。他们全盘否定十七年宗教工作的成绩，取消宗教工作的机构，禁止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把宗教界爱国人士、甚至信教群众当成牛鬼蛇神予以“横扫”，企图用专政的办法在一个早晨消灭宗教。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作法，伤害了信教群众的感情，给个别披着宗教外衣的反动分子以趁机利用、煽动宗教狂热的口实。现在，宗教领域提出了许多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我们必须有一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指导思想，不然，就会象没有导航设备的飞机轮船一样，走偏了方向。在宗教研究中，我们一定要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在宗教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是否可以抛弃任何既定之见呢？这种说法很吸引人，但真正这

样做的人我们似乎还不曾见到过。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里，这个社会又是长期的历史发展的产物，很难不受任何既定之见的影响！再说，对既定之见也得作点具体分析。“见”，有性质之不同。有错误的谬见，片面的偏见，过时的成见，也有经受实践验证过的真知灼见，我们不应搞绝对化，对任何既定之见来一个一概抛弃。所谓抛弃任何既定之见已成了宗教学者的普遍的看法，那或者是不能兑现的自我表白，或者是别有用心的欺人之谈，是相信不得的。

看来，这种抛弃任何既定之见的要求不是偶然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行封建法西斯的政治统治和假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统治，给我们的事业所带来的重大灾难之一，就是玷污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纯洁性，因此，当我们在各条战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时候，就难免会出现各种思潮。这是势之必然，不足为怪。不过，我们总应保持清醒的头脑，拔除稗草而注意不要伤及秧苗，在否定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假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应该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历史实践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基本原理确是科学真理，应该作为我们研究和处理当前宗教问题的指南。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他们的伟大一生中，写下了一系列关于宗教问题的专门著述。他们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阐述了宗教的本质及其在社会历史上的作用，揭示了宗教存在的根源及其发生、发展和走向消亡的规律，全面批判了宗教神学和各种形式的信仰主义，制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宗教问题的方针和政策。这些论著给我们提供了一把打开天国秘密的钥匙。

在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经典文献中，马克思于一八四四年所写成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占有特殊的地位，它标志马克思在世界观上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

义、在政治上实现了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而在这部光辉著作中，对宗教问题的讨论又占有特殊的地位。马克思总结了德国哲学的宗教批判的优秀成果，把宗教批判和共产主义革命联系起来，全面阐发了马克思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理论。这部著作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基础，至今仍放射着真理的光辉。当我们结合当前宗教领域提出的问题重读这部著作时，总感到它的基本思想仍是那样的清新，给我们许多新的启发。我们应该对这部著作进行更认真的学习和更深入的研究，力求全面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理论。本文就是笔者重读《导言》后，对它阐发的几个重要的宗教理论问题的体会和认识。

二

《导言》开宗明义第一句：“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实际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马克思在这里对宗教批判在德国革命中的作用和意义作了高度的评价。他把对宗教的批判和其他一切（政治、法、国家、社会）的批判紧紧地联系起来，把前一种批判看成是后一种批判的前提，把后一种批判当成前一种批判的目的。在马克思看来，对宗教的批判并不单纯是一个宗教问题，而是富有政治意义的斗争，是为德国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开辟道路，准备条件，创造前提。

为什么“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导言》作了扼要的说明：宗教是对人间谬误的一种天国的辩护，它用上帝的名义为现实的苦难世界加上一道神圣的灵光圈。如果不首先驳倒这种天国的辩护，人间的谬误就不可能裸露在世人的面前，而“谬误在天国的申辩一经驳倒，它在人间的存在就陷入了窘境”，一当我们搬掉宗教加于苦难世界的灵光圈，这个苦难世界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根据。“因此对宗教的批判是对苦难世界——宗教是它

的灵光圈——的批判的胚胎。”①(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马克思从社会革命的角度来考虑宗教批判，这个思想非常深刻，表现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与旧无神论和启蒙思想家的根本区别。当然，旧无神论，特别是十八世纪法国无神论对宗教神学、信仰主义、蒙昧主义和教权主义的批判，也曾为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作了思想上的准备，起了革命先导的作用。但是，当时的思想家们主要还是从理论的角度，从尊重理性、提倡科学的立场来进行这种批判。他们希望通过启蒙教育来克服人民的愚昧无知，以摆脱宗教迷信的蒙昧状态。他们是思想家，而不是革命家。马克思则不同。还在一八四一年九月二日，赫斯(此人对德国共产主义思想潮流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在一封通信中谈到了他第一次见到马克思的印象：“他无论在思想上或在哲学的、精神的发展上都不但超过了施特劳斯，而且超过了费尔巴哈，而他的这种哲学的、精神的发展是有很大意义的……马克思博士，这个我所最崇拜的人，还是一个十分年轻的人(至多不超过二十四岁左右)，他将给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以致命的打击；他既有深思熟虑、冷静、严肃的态度，又有最辛辣的机智；如果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合为一人(我说的是结合，不是凑合)，那末结果就是一个马克思博士。”②马克思同时打击中世纪的宗教与政治，集思想家与革命家于一身。

对于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这句话，既是理论的原则，又是行动的纲领。他和恩格斯积极热情地

①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部分，第1卷，下卷，第260—261页。见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322页。三联书店1963年版。

参加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前后由青年黑格尔派发起的批判宗教的斗争，他俩都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马克思还参加了此派的核心组织——“博士俱乐部”。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场斗争的目的，“是要消灭传统的宗教和现存的国家”^①。斗争起了极大的思想解放作用。政治上，暴露了基督教作为德国封建专制政权的精神支柱的反动性；理论上，揭示了宗教作为人的幻想的创造物的荒谬性，最后发展为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马克思在《导言》中的第一句话为这场斗争的进程作了总结。在他看来，斗争已经取得了应有的成果，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因而，“就德国而言，对宗教的批判实际上已经结束”。下一步的任务应该是沿着宗教批判所创造的前提条件，进行“对其他一切的批判”。

马克思关于“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的论断，其直接所指，虽然是就当时的德国而言，但却有普遍的意义。因为马克思这个论断是以对宗教的本质和社会职能的认识作为立论的根据。无论何时何地，宗教本身就是“颠倒的世界观”，就是一种“谬误”，就是对人间谬误的天国申辩。唯其如此，我们在历史上看到，重大的社会变革几乎都曾伴随着一场批判宗教神学、暴露人间谬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理论斗争。欧洲近代史上多次出现气势磅礴、影响深远的启蒙思想和无神论思潮，这些思潮的出现，都是直接为变革旧世界的革命运动服务的。十五世纪的人文主义、十六至十七世纪的泛神论、十七至十八世纪的自由思想和自然神论、十八世纪的百科全书派……此伏彼起，浪逐潮高，它们分别为意大利、荷兰、英国、法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革命的进行扫除思想障碍，提供理论武器。历史事实的重复性，

^①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7页。

证明这决非偶然的机遇或巧合，而是体现了必然的历史规律。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代，宗教如何为人间谬误辩护，宗教批判又如何进行，那必然各有自己的特殊性，但马克思所说的宗教为人间谬误辩护，通过宗教批判为对其他一切的批判作某种准备，这看来并非专就德国而言的特例。

宗教在中国历史上的情况，有其一般宗教所同具的普遍性。传统天命论的宗教神学和其他宗教作为颠倒的世界观都曾被历代统治者所利用。它们把专制君主神化为“奉天承运”的“天子”，把苦难社会说成是上帝的“天命”，用因果报应、天堂地狱的说教去麻醉被压迫人民的意志，这表明中国宗教和其他国家的宗教一样，都起着为人间谬误作辩护的作用。因此，在我国历史上的重大社会变革时期，也不断出现批判传统宗教神学的无神论思潮。例如，在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变时期，以荀况为代表的无神论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去批判为没落奴隶制作论证的传统天命论。在从封建制到资本主义转变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为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提出了“天革而他革乃可言矣”的“革天”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爆发了五四运动，这是一场反封建主义的政治运动和启蒙思想运动，对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其中包括天命论和其它宗教迷信)进行了全面的批判，起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作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中宣传无神论，批判作为封建社会四大支柱之一的封建神权。一九七九年党的三中全会前后，我国理论界开展实践标准讨论，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行的以信仰主义、蒙昧主义为特征的现代宗教迷信，为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胜利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但是，中国宗教也有其不同于欧洲等地的宗教的特点。除了少数民族地区，就整个中国而言，各种宗教是同时并存的，没有一种宗教象基督教在欧洲、伊斯兰教在阿拉伯世界那样，在全国

取得独占的统治地位，从而形成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这种情况虽然并没有否定宗教批判的必要性，但也决定我国不象近代欧洲各国那样具有通过批判宗教神学为政治革命准备前提的紧迫性。在反封建斗争中，我国也曾不断出现无神论和启蒙思潮，但其深度和广度则受到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达到近代欧洲那样的程度。

现在，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与马克思写作《导言》时的德国相比，情况有根本性的差别。但社会生产力仍未充分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尚待继续健全，旧时代（例如封建制）的残余依然存在，而封建制残余之类东西在意识形态上常常借助和表现为各种形式的信仰主义和蒙昧主义。这是我国现阶段宗教和封建迷信活动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宗教和封建迷信活动与社会主义制度本质上是对立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宗教迷信受到限制，但其性质并未改变。宗教作为颠倒世界观的本质没有变，谬误不会变成真理。天国的幻想永远是对人民意志的麻醉，对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改造客观世界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产生消极的影响。至于旧的残余，社会渣滓利用宗教迷信进行谋财害民的非法活动，个别反动分子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社会主义活动，更不容我们视而不见，置之不理。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宗教神学决不能放弃批判的态度。

三

《导言》对宗教的本质及其根源作了精辟的论述。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一方面继承了从青年黑格尔派到费尔巴哈无神论的优秀成果，另一方面又批判和克服了它们的局限性。

关于宗教的本质和根源问题，历来是宗教神学和无神论斗争的焦点之一。欧洲的基督教神学家总是说基督教是上帝启示的产

物，圣经的一字一句都是上帝的启示。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主要就是针对这种神学的说教。施特劳斯认为基督教不是起源于上帝的启示，而是发端于早期基督教社团中自然发生的关于耶稣的神话故事。这些故事虽然并非个别作者的故意捏造，但亦并非历史事实。但是，既然施氏说它不是历史事实，这也就意味着它是神话作者的创造。至于此种创造是作者有意栽花，还是无心插柳，都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布鲁诺·鲍威尔则认为圣经故事的产生不是观念的自然发生，而必须通过人的自我意识。福音书的内容没有丝毫实际的可能性，甚至耶稣在历史上也并无其人，这些东西完全是福音书作者的文学创造。因此，基督教神圣历史的全能创造者并不是神，而是人类的自我意识。鲍威尔说，人本来是创造神的主体，可是造神以后却反过来遭受教义信仰的束缚。所以，人类现在的任务便是对基督教义以及浸透了基督教信仰的国家进行彻底的批判，摆脱基督教的压迫。

施特劳斯的宗教神话自然发生说和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创造说尽管说法不一，彼此争辩不休，但二说都剥去了基督教及其圣经的神圣外衣，实质上都是把它归结为人类的创造。但二人把创造宗教神话的人或者说成是精神性的客观实体，或者说成是自我意识，因而在他们那里，人并不是真正的人，而只是作为黑格尔绝对观念之表现或外化的人。

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把他弄颠倒了的观念与人的关系颠倒了过来。观念变成了人的观念，是人对自然界的反映，而不是世界的本体。费尔巴哈用这种唯物主义世界观来说明宗教的本质和起源。他指出，宗教中关于上帝的一切属性和本质都是人类把自己的属性和本质加以异化的结果。他的结论是：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这种人本主义的唯物论和无神论彻底否定了宗教和上帝的神圣来源，把它还原为它的世俗基础。

费尔巴哈的理论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观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在《导言》中总结了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关于人创造宗教的思想，把这看成自己进行反宗教批判的理论根据：“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就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水平。他仅仅是把费尔巴哈这个思想作为继续前进的出发点，而不是作为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世界观发展的终结。马克思在继承他的优秀成果的同时，立即着手克服它的局限性。

《导言》指出费氏的主要局限就是把他从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孤立出来，看成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他没有进一步认识到人是社会的产物，不知道“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因此，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在把宗教世界还原为人以后，就停止了自己的研究和批判，没有进一步批判人所生活的环境，即国家和社会。他在理论上没有深入揭示宗教产生的根源，在政治上更没有得出革命的结论。

费尔巴哈止步不前的地方成了马克思宗教观的新起点。马克思从人异化出宗教世界这一点出发，进一步发现出人之所以异化出宗教的社会基础。宗教关于上帝造人的说教，无疑是一种颠倒的世界观，但这种颠倒的世界观所以能够产生出来，原因在于它的后面有一个颠倒了的世界：“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所谓‘颠倒了的世界’，说的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就当时德国而言，即指封建专制的国家。在这种颠倒的世界里，人民没有人的权利和地位，没有过真正的人的生活，用哲学术语讲，就是人的本质没有实现出来，人没有真实的现实性。于是，人就把自己的本质异化为幻想的救世主，希望在一个幻想的天国里过幸福的生活，作一个符合于人的本质的真正的人。脱离宗教异化的社会基础就不可能了”。

解宗教异化的根源，离开“颠倒了的世界”就不可能说明“颠倒了的世界观”的产生。

一八四五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把这个思想作了更明确的说明：“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哪。因为，世俗的基础使自己和自己本身分离，并使自己转入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因此，例如，自从在世俗家庭中发现了神圣家族的秘密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应当在理论上受到批判，并在实践中受到革命改造。”^①在这里，马克思不仅发现了宗教异化的社会根源，而且进一步指出了最后消灭宗教异化现象的根本途径。既然宗教异化的根源是“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那末，单纯地揭露宗教异化现象是不足以消灭它的，只有进一步消灭那自我分裂和自我异化的世俗基础，即消灭那以剥削制度为基础的世俗社会和国家才能提供这种可能性。《导言》已从理论上的无神论出发得出一个政治上革命的结论：“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在驳倒宗教神学（“彼岸世界的真理”）以后，我们的历史任务就是通过对法和政治等等的批判在人间建立真理和正义的社会（“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页。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这段话里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异化”：一种是人的本质自我异化为“神圣形象”，一种是它自我异化为“非神圣形象”，后一种异化是前一种异化的基础。由于费尔巴哈只是揭穿了前一种异化，所以马克思提出：“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这项迫切任务是马克思在紧接《导言》之后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执行的。马克思认为，生产者的劳动过程实际上是一种人性的异化过程。人通过劳动把自己的本质异化或对象化为劳动产品，但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社会里，劳动产品却不属于劳动者本人所有，于是，劳动的现实化表现为劳动者的非现实化，劳动的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并为对象所奴役。劳动产品变成资本家的资本，劳动者转而受到自己的异化物（即资本）的统治。为了克服这种人性的异化，无产阶级就必须通过社会革命粉碎剥削制度，使劳动产品归劳动者所有而不再成为与自己作对的异己力量，过去异化于劳动产品之中的人性（人的本质）从而得以恢复，无产者于是就成了自己劳动的主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劳动异化现象的消灭，也就是整个社会的解放。随着社会异己力量的消失，必然导致宗教异化的最后消亡。马克思就这样把克服宗教异化的无神论和克服劳动异化的共产主义革命紧紧地联系起来：

“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因此，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宗教的异化本身只是发生在人内心深处的意识领域中，而经济的异化则是现实生活的异化，——因此异化的扬弃包括两个方面。不言而喻，在不同的民族那里，这一运动从哪个领域开始，这要看一个民族的真正的、公认的生活主要是在